

「愛國者治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張志剛 慶祝回歸 25周年

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又或者保守一點來說，是最大挑戰之一，就是管治能力的提升。在全球大國博弈下，環球安全形勢嚴峻，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又同時是國家最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外來的因素，對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構成了新的考驗。

事實上，「管治」是全世界各地政府要共同面對的難題，互聯網時代徹底改變了全球的政治生態，政治問題本質的多樣性以及發生變化的速度，都令各地執政團隊難於應付。而這個全球普遍的難題，在香港的客觀形勢下，就更為突顯。

反中亂港勢力千方百計破壞

香港在管治上遇到的難題，主要有幾方面。在回歸之前，香港本身並無「自我管治」的經驗，香港的管治，完全由英國

人一手包辦，枱面上固然是「港督」代表英女王管治香港，而在操作層面，也有成百上千的級別英籍官員，他們由英國本土以至其他英國屬地派駐香港，他們遍布政務職系，以至各重要部門，包括紀律部隊，所以回歸前香港的管治是「英人治港」。中央對香港最主要的政策方針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在九七回歸之後，中央政府沒有參照「英人治港」而推行類似做法，而是堅決落實前所未有的「港人治港」。

對於「一國兩制」，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一百多年，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資本主義在香港持續發展，所以「兩制」不但可以共存，甚至香港這「一制」，可以為母體的社會主義提供養分，令到「兩制」可以有機結合。但「港人治港」則在回歸前並無歷史，直到1997年回歸之後，才經中央授權落實「港人治港」，由「英人治港」直接過渡到「港人治港」。所以「港人治港」的含意，必須是對照於「英人治港」才體現其含意，而「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亦有高度關連。因為國家

母體是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及社會制度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截然不同，要貫徹「一國兩制」，那就一定要同時落實「港人治港」。而要「港人治港」得到充分發揮，其高度的自治權力又是必要條件，所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者並不分離割裂，而是高度相連。

因為「港人治港」是回歸之後的新事物，需要時間發展成長是理所當然。如果全港上下一心，以擁護「一國兩制」，為港人謀福祉為最大共識，那在「港人治港」之下，由本地香港居民所組成的特區政府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建立管治威信。但可惜回歸之前，由英國政府刻意培育的本地反中亂港勢力並不支持順利回歸，他們詆毀「一國」，破壞「兩制」共存的條件和環境，他們長期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站在對立面，並且以破壞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來爭取他們的利益。面對有龐大外部力量支持的反中亂港勢力，新成立的特區政府長期處於推打的情況。

基於中央政府對「港人治港」的最大信心和誠意，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

機關最終經普選產生，而反中亂港勢力就利用中央的最大信心和誠意，用盡種種煽惑方法，企圖利用選舉作為顛覆奪權的手段，正因如此，民主選舉就不再是以選賢與能為目標，而成為製造矛盾、對立、仇恨、怨憤的平台。由九七回歸之後，民主選舉幾乎是徹底主導了香港二十多年的政治議題。所有社會問題，最終都扯到民主選舉的問題之上，而增加選舉的民主成分，都是唯一的標準。

中央撥亂反正護港穩定繁榮

當外部力量和本地反中亂港勢力已經緊緊勾結一起，在當時的情況，已經走到一個瓶頸，而這個勾結力量已把奪權放到日程表。面對這種情況，中央不能再袖手旁觀，而這種政治矛盾，不是「兩制」內部的政策矛盾，而是提升到政權組成的層次，也是中央政府必須插手處理的層次。

要撥亂反正，要突破瓶頸，要「港人治港」可以再走下去，中央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對於「港人治港」，中央政府除了以最大的信心和誠意，也對「傳

統反對派」給予最大的包容。在回歸伊始，這些人的所作所為，許多是違基本法，甚至有違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身份，但中央仍然一再容忍，希望通過溝通，讓這些「傳統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可以更了解國情，最後可以重回正軌。但事實證明，他們不但不領情，甚至變本加厲，越鬥越兇，最終導致2019年的大規模暴亂，最終中央政府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將危害國家安全分子繩之於法，再完善選特區舉制度，只有符合愛國者條件的人才才能進入建制，成為「港人治港」的合資格一分子。

所以「愛國者治港」原則，就是要打破以民主選舉作為口號實際是要顛覆奪權這個惡性循環，「愛國者治港」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要手段，有了這種手段，才可以為「港人治港」創造有利的憲制和政治條件，香港才可以長治久安。

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官商民合作締造關愛社會



議事 李國棟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指出，香港的住房問題需要解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韓正看望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參加討論時指出，要解決房屋問題等深層次矛盾，讓市民「看到希望，得到實惠」。

數年前，我和我的研究團隊曾作出研究，發現市民的幸福感受眾多因素所影響。經濟固然影響市民福祉，但其他範疇，包括房屋、家庭、交通、收入及收入再分配、工作、健康、安全等表現，以至公共政策的角色亦屬關鍵。

「告別劏房」需有路線圖

土地房屋短缺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私樓樓價貴，不要說基層市民，即使是中產家庭亦難以負擔。無力置業的處境下，收入超過申請公屋入息及資產上限的家庭，租住私樓是解決住屋問題的唯一選擇。租屋需求大，導致租金節節上升。符合資格的市民會申請入住公營房屋，惟輪候時間平均長達6.1年。等候「上樓」期間，唯有屈居於不適切居所——「劏房」。香港亟需一個「告別劏房」的路線圖。

隨着社會不斷進步，政府在傳統以賦稅實行財富分配的模式外，致力引進新動力、新價值觀以解決社會問題。方向一是利用社會資本，結合商界、民間和政府力量，加強民、商、官合作，扶助弱勢社群。

過渡性房屋「同心村」是全港首個大型過渡性房屋項目，設有1800個不同戶型的單位，配合不同居民的需要。這個三方協作回應市民住屋需要的計劃，由特區政府提供建造經費和由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擔當着促進者的角色，發展商以名義租金一借出面積約23萬方呎的土地，為商界關愛社會提供了新的模式，民間組織，聖公會福利協會則負責興建及營運。

在幾何學上，「同心」就是物體的軸心或中心軸均在同一位置。同心村落成，展現官、商、民從心出發、同心協作，解決基層住屋需要的成果。事實上，扶貧助弱要取得更大成效，為市民大眾締造關愛共融的社會環境，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援和共同

參與。特區政府需積極凝聚各界力量，透過政策措施，促進社會民生平衡發展，尤其是進一步深化與商界，以至社會不同的界別，包括社會福利界的夥伴合作模式，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全面、更適切的支援。而近年，愈來愈多人認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的義務，願意為社會整體利益及需要作出承擔；既解決社會問題，亦可創造經濟與社會並重的價值。

筆者感謝發展商借出土地以興建為期不少於八年的同心村，此舉不但展現商界對社會的關懷，同時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新思維、新思路。同心村由申請、動土、建造到落成及入住用了不足20個月，能夠在短時間內由籌劃到落成，實有賴眾多機構和人士的參與，包括運房局及其他政府部門、發展商、新界鄉議局、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元朗區議會等。特別感謝持有土地業權的發展商對同心村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支援前期建築規劃，為地盤進行基本平整，於施工期間給予的協助。

以創新模式解決「住屋難」

同心村是以「以人為本」為設計宗旨。村內設有便利士多、生活用品借用館和社區小廚等。項目引入「健康八指標」，按住戶日常生活必須的八個方面的指標，包括科技、健康、情緒、靈性、社交、環保、理財和就業提供服務，讓居民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建立自信，在身、心、靈各方面均得到照顧。聖公會亦積極授人以漁，為居民提供就業支援，優先考慮安排在區內就業，減少他們跨區工作的奔波及交通費的負擔。村內亦設公共空間，提供休憩、康體和兒童遊樂設施，另有一條10米闊的中央步道，藉此鼓勵居民多做運動，締造一個切合居住需要，易行、易達、宜居的環境。

政府透過善用閒置土地及建築物提供短期居所，以紓緩久候公屋的家庭面對的困難。同心村的落成希望能為居住在惡劣環境的家庭，提供過渡性支援，藉此向社會傳遞更多積極的正能量。更重要的是期望這個項目對社會帶來一定的啟發性，啟發社會各界採取多渠道及創新模式籌劃房屋計劃，盡快解決香港「住屋難」問題，為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燃點告別「劏房」希望，讓市民早日提升幸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董事會暨執行委員會主席、前智經研究中心理事

全力落實「五點期待」 提升管治能力促人心回歸



議論 風生 許紹基

中央人民政府日前依法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26名主要官員，國務院港澳辦同日發表《新團隊 新氣象 新篇章》的重要文章，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五點期待」。事實上，這不僅是「期待」，更是要求，新一屆政府必須將這「五點期待」作為未來的施政重點，逐一破解困擾香港多年的痼疾，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早日實現良政善治。

「五點期待」中，第一點是「期待在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上有更大作為」。之所以將之放在首位，原因並不難理解，正正是因為過往社會上有部分人未能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甚至出現反中亂港勢力故意曲解「一國兩制」的情況，導致有一些人只談「兩制」，不講「一國」，將高度自治視作為「完全自治」，最終引發黑色暴亂。若非中央政府果斷出手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外國勢力到今天仍可能肆意干預香港事務，反中亂港政客仍會在特區體制內瘋狂破壞特區政府施政。

做好「一國兩制」教育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今天的香港繁榮穩定，所以新一屆政府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這無疑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關鍵所在。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愛，可以說是溢於言表，從國務院港澳辦的重要文章就可以看到，中央一直支持香港撥亂反正、重回正軌，亦只有如此，特區政府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樣才能搭上國家發展快車，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

要真正做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新一屆政府這方面的工作可說是責任重大。香港特區成立以來，歷屆特區政府都致力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惟因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上存有漏洞，外國勢力有機會透過其代理人干預香港事務。國安法實施和選制完善後，反中亂港勢力再不可能進入建制，但他們仍然會在暗處藏匿，伺機

挑起事端，故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全力以赴，把這些隱患逐一清走，並盡快展開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工作。

除了政治制度、選舉制度、法律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外，特區政府更要做好「一國兩制」教育工作。事實上，只要全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能準確認識和理解「一國兩制」，明白了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白了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明白了中央對香港特區有全面管治權、明白了香港的政制必須按基本法而行，自然就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這方面，教育局和即將成立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可說是任重道遠，挑戰一點都不小。

除了「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上有更大作為」外，中央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待，還包括「期待在務實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上有更大作為」、「期待在全面促進香港社會事業發展上有更大作為」、「期待在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有更大作為」及「期待在不斷鞏固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優勢上有更大作為」。

帶領全港市民開創更好未來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一國兩制」實踐亦進入新階段，香港在過去那段「泛政治化」的日子，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機會和光陰，接下來，在香港環境已趨平穩的情況下，李家超和新一屆政府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中央寄予厚望，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充滿期待。

新一屆政府必須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善於履職盡責，勇挑重擔、積極作為，奮力譜寫香港發展新篇章，不辜負習近平總書記的囑託，不辜負中央的厚望，不辜負廣大香港市民的期盼。積極作為，朝着中央政府提出的五點期待進發。

站在「愛國者治港」的新的歷史起點上，香港特區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祖國作堅強後盾，相信堅定的愛國者一定會把香港建設好、發展好、治理好；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必將團結帶領全港750萬市民同心同向、攜手並進，共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共譜「一國兩制」實踐的嶄新篇章。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反噬苦果凸顯美國反華的戰略困境



國際 關係 張敬偉

美國對華關稅戰讓美國嘗到反噬苦果。美國40年來破紀錄的高通脹，成為拜登政府的硬傷。如何抑制通脹？美國前任和現任美聯儲主席給出了兩種藥方。

一種是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加息猛藥。美聯儲已於3月、5月分別加息25個基點、50個基點，然而美國通脹依然高企。本月15日，美聯儲再下加息猛藥——75個基點，成為1994年以來的最大加息幅度。當日，紐約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跌，釋放出市場擔憂美國經濟下滑的信號。而且，鮑威爾將影響美國經濟的因素歸咎於俄烏衝突和疫情因素。起碼現在看來，鮑威爾開錯了藥方。

美三度加息通脹仍舊高企

一種是前任美聯儲主席、現任財政部長耶倫的觀點，她認為要平抑美國通脹，要重新配置特朗普時期對華商品加徵的關稅，強調對華3000億美元商品的加徵關稅

「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而且，這也是耶倫一貫的立場。這說明，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戰，是導致美國高通脹的關鍵原因之一，也意味着美國對華關稅戰對現在的拜登政府來說已經帶來反噬效果。其實，早在美國對華啟動關稅戰時，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的有識之士抑或全球分析家，都已經預判到了。而且，拜登在大選時也強調當選後要改變對華關稅戰政策。

美國濃厚的反華氛圍下，拜登不僅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戰政策，而且加速對華科技、資本領域的脫鉤。此外，拜登還加劇了意識形態反華，布局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反華，將對華「極端競爭」推到極致。當拜登總統濫用貨幣放水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增長後，高通脹負效應隨之而來，放水刺激經濟的是美聯儲，加息抑制通脹的也是美聯儲，互相矛盾的美聯儲政策，自然難以消弭破紀錄的高通脹。當美聯儲藥方失效，想改變或重新配置對華關稅時，拜登政府面臨的不僅是對華關稅戰的反噬，也讓拜登政府的反華政策變得可笑，彰顯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缺乏戰略

前瞻和整體協同。

若美聯儲加息抑制通脹無效，拜登政府將面臨嚴峻的中期選舉壓力，甚至會變成「跛腳」總統，2024年大選前景黯淡。若改變或取消對華關稅戰政策，意味着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失敗。而且，拜登政府減少或取消對華3000億美元商品關稅，還會遭受共和黨和反華勢力的「內噬」。而且，美國反華的戰略性加碼，加劇了中美兩強的緊張關係，讓兩國信任赤字陡增。美國調整對華關稅政策，面臨着進退失據的困境。美國高通脹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美國反華的尷尬，也照出拜登政府的難堪，美國反華的反噬和美國國內的「內噬」讓拜登政府陷入難以抉擇的戰略困境。

美國對華科技戰的反噬效果也不可小覷。近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指出，美國運營商拆除華為、中興等中企生產的設備耗資將達53億美元，遠超去年美國會通過的19億美元預算。多出的成本，自然由美國企業和民眾埋單。可預料的是，美國對更多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會給美國帶

來更多更持久的負面影響。畢竟，中美兩國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從貿易到科技再到資本，已經形成了深度的利益攸關關係，基於政治原因武斷脫鉤，對兩國是零和博弈，對美國則會帶來更為廣泛和持久的反噬。

短視政策加重民眾負擔

疫情和俄烏衝突帶來的全球產業鏈循環不暢和供應難題，讓拜登政府加速在半導體等領域和中國脫鉤，欲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建立排除中國的供應鏈。印太國家和中國均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在核心產業鏈上更形成了密不可分互利多贏的紐帶關係，拜登政府要構建孤立中國的供應鏈，就是斬斷印太國家和中國的互利多贏關係。

這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因為印太國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即使表面上配合美國反華，也不願和中國失去經貿聯繫。區域各國，無論是日韓、東盟10國還是澳紐及太平洋國家，他們固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傾向和地緣政治的偏好，但也不願在經

貿利益和供應鏈上脫離中國。而且，拜登政府的政策設計能維持多久還是未知數。美國政黨政治的特點，決定了美國政策的短期行為。

更糟的是，旨在通過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的《美國競爭法》進入國會協商的關鍵時刻，若法案實施，美國國會將對中國網絡審查作為重點並以此對華實施懲罰性關稅。這一帶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法案，將使美國陷入對華關稅戰的惡性循環中。事實卻是，對華關稅戰（制裁）不僅推升美國通脹，而且加大了美國企業和民眾的生產與生活成本。這一法案，也將誤傷很多的美國盟友。因此，這一充滿政治偏見和霸凌色彩的法案，美國將會收穫來自中國和盟友的更多反噬苦果。

美國不是萬能的。美國兩線作戰——歐洲反俄、印太反華，讓美國疲於應付。美國國內高通脹和中期選舉，讓拜登政府壓力山大。內憂外患，是拜登政府難解的戰略困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